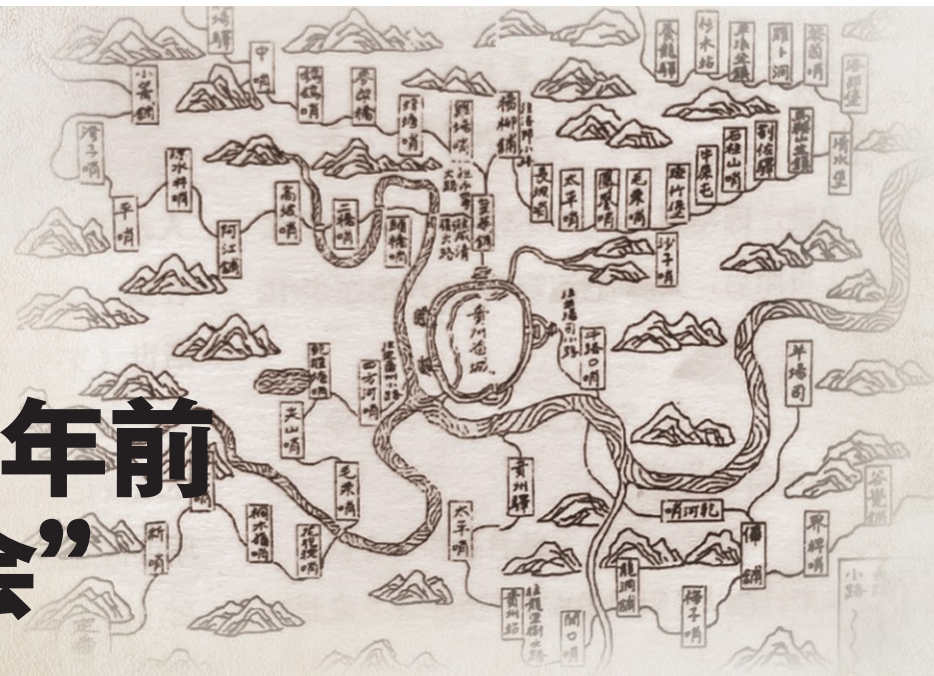

古籍文献记载:“安顺府城……,远胜贵阳。”

昔,尝议立省会于此。以秤土轻重,不及贵阳,故舍此从彼。由此引出了一段明初贵州“秤土,以轻重定省会”的奇闻轶事。安顺和贵阳“秤土定省会”,看似近乎荒诞不经,实则从侧面折射了建省之初依据历史、经济、科教、文化、人口、交通等多方面综合考量,最终确定贵阳作为省会城市的历史性战略抉择。

趣谈贵州600年前“秤土定省会”

“黔地中心”论

明之前,黔地原分属于湖广、四川、云南三省管辖,被视为三省的边荒之地。历史上,久为“湖广、四川、云南喉衿之地”“西南之奥区”。

明初,在黔遍立卫所,畅通驿道,并大规模移民入黔。“调北填南”“开一线以通云南”,控扼西南边疆的国家战略,集中体现在贵州行省的建立。

以地理位置论,省会多居一省之腹地,几乎成为一种共识性惯例。检阅现今贵州版图不难发现,在九个地州市中,只有贵阳市和安顺市均可堪称之为“黔中腹地”。今贵阳市东南邻黔南,西靠毕节又安顺,北接遵义又毕节,足以堪称“黔省腹中之腹”。民国时期《贵州名胜古迹概说》载:“贵阳县为省会所在,当四达之郊,控百蛮之会。自明隆庆时,移程番府于今县城,始名贵阳,府治也”。“当四达之郊,控百蛮之会”,寥寥数语,即高度概括、精辟阐述了贵阳的历史地理区位。

今安顺市东邻贵阳又黔南,西靠六盘水,南连黔西南,北接毕节。《咸丰·安顺府志》载1851年时任提督贵州学政翁同所作《序》,云:“黔之属……东西率介楚滇,南北率介粤蜀。独安顺四竟皆介黔壤,在黔实为腹地。”《咸丰·安顺府志》又载题款为“咸丰元年四月下澣无棣吴式芬谨撰”的《序》,云:“黔之腹,滇之喉,蜀粤之唇齿”。“四境皆介黔壤”,只言片语,即经典归纳、传神描述了安顺的历史地理区位。

有趣的是,因军事重心西移等因素,贵州建省并定治所于贵阳后,安顺曾一度成为贵州的军事中心。

“秤土定省会”说

长期以来,“以贵阳旧名而得贵州省名”之说,曾一度盛行。清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在《赠某总戎》中有诗注“黔以州名”。田雯“黔以州名”之说,实则也是指贵州省名的得来系沿用贵阳旧名。

974年,占据今贵阳一带的乌蛮人(彝族先民的一支)首领普贵纳土归附于中原王朝。“远人来服”,令宋太祖赵匡胤龙颜大悦,其在《赐普贵敕》中称“惟尔贵州,远在要荒”。贵阳之地,开始进入中原王朝视野,“贵州”一名亦始见之于官方记载。至明初贵州开省,取贵阳为省会,诚有历史渊源可溯。

历史上,以地理位置、城市规模,以及繁荣程度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而论,贵阳和安顺两地都具备成为贵州省治所在地的条件,各有所长,又各有所短。

开省建省之初,既然两地优势、实力不相上下,且不时有“议立省会于安顺”之议,那么只有取土而秤,于是产生了“秤土定省会”之说。

贵阳与安顺“秤土定省会”之说,应发生在明永乐年间,即贵州建省之初。此说,最初见之于清人陈鼎所著《滇黔纪游》:“安顺府,城围九里,环市宫室皆壮丽宏敞。”

“人家以白石为墙壁,石片为瓦。估人云集,远胜贵阳。昔,尝议立省会于此。以秤土轻重,不及贵阳,故舍此从彼”。这段文字,曾为后世《安顺府志》所引。

后世有一“好事者”,在文学作品中,亦曾引述这段记载:“安顺州,在元为习安州。城围九里,环市宫室皆宏敞壮丽。人家以白石为墙壁,石片为瓦,估人云集,远胜贵阳。昔,尝欲立省会于此。”

因秤土轻重不及贵阳,故舍此从彼。

清代史学家陈鼎到黔、滇两省许多地方游览、考察,写下了《滇黔纪游》二卷,上卷纪黔,下卷纪滇。作为一个用亲身所见所闻记述滇黔的历史学者,陈鼎在《滇黔纪游》中“有板有眼”地行诸文字,且为后世方志所引。可见在清代贵州,一直盛行着贵阳与安顺“秤土定省会”之说。于是,自陈鼎而始,民间口头传说,演变成了“白纸黑字”。

明代安顺地里(理)图

如陈鼎所言,为什么会有“尝议立省会于此(安顺)”出现?显然其所列举的“宫室皆宏敞壮丽”“估人云集”,是安顺明显的优势。这种说辞,在万历年间郭子章《黔记》中似乎可以找到印证。《黔记》载:“贵州省城,洪武五年(1372),都司马烨筑。”为此,郭子章有奏疏曰:“国初建贵州省城,率因元旧,城址狭隘,城垣卑薄”。

相较郭子章、陈鼎的说辞,贵阳在建省之前和开省之初的城市、人口、建筑等规模,都显然不及安顺。而一句“远胜贵阳”,则可窥见差距还相当大。因为贵州建行省,谋自洪武年间,成于永乐年间。从时间上可以支撑两地存在竞争省会的事实。

“秤土轻重”,用今天的专业术语描述,就是“度量单位土体积中颗粒的有效重力”。“秤土定省会”,具体而言,就是在贵阳、安顺各取同样多的土,然后测定重量,以重者为胜。取胜者,即定之为省会。陈鼎所言之“以秤土轻重,不及贵阳”,应为因“一捧土”的重量不及贵阳,安顺在与贵阳的省会之争中败北。

当然,在两地争执不下的情况下,“取土比轻重”定省会,不失为一个可以让古人信服的办法。

几百年的发展事实雄辩地证明,两地竞争省会的结局不是“两败俱伤”,而是“贵州省赢了”。用今天的话说,这是“良性竞争”的结果。“以土服人”足可见古人之智慧!

历史场景复原

时隔数百年后,在今天,我们依然可以根据古籍文献之记载,在合理想象的历史空间,用文学的手法“复原”出当年“秤土定省会”的场景。

明洪武年间,根据朝议结果,准备在“湖广、四川、云南喉衿之地”“西南之奥区”新开设一行省。于是派出官员按惯例赴这一区域的腹地都会“贵州”(贵阳旧名,贵州宣慰司城)和安顺两地考察,反复论证,最终预选贵州宣慰司城(便于表述,以下“贵阳”多指贵州宣慰司城,即今贵阳)作为省会城市。

为此,明廷自明初就开始布局。新设省级军事机构,取省会旧名“贵州”而命名为贵州都指挥使,领黔中诸卫所,并派时任都司马烨建省城。对此,安顺绅耆颇有微词,提出“论城市、人口、建筑等基础规模,安顺都优于贵阳,理应设省会于安顺”,但朝廷中有识之士却从全局考虑,坚持认为省会应设在贵阳。

听说有机会成为省会后,贵阳和安顺两地民间都跃跃欲试,志在必得。定贵阳为省会,安顺不服;定安顺为省会,贵阳不服,两地历届主官为竞争“省治所在地”也常闹得面红耳赤。

争论不休,久之难决

随着开省条件趋于成熟,永乐十一年(1413),明成祖朱棣最后下了建省决心。二月,诏令下,设置贵州等处承宣布政司。新升任的、主管一省之行政和财赋之出纳的藩台、藩司(布政使大人)决定摆到台面上来解决省会这一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。

足智多谋的御史(言官)提议召集两地绅耆来议事,广泛听取民意,寻找一个能让双方都信服的定夺办法。于是,一帮官员和有头有脸的绅耆都争相文绉绉地列举各自历史、区位、经济、科教、文化、人口、交通、物产等多方面的优势,互不相让。

见多识广的布政司幕僚们见议不出个结果,于是提出,不妨参照民间解决土地分割争端中“骑木马划界”的土办法。原来,黔中相较中原开发较晚,毗邻村寨对无主土地的分割常起争端。后来人们发明了一个办法,即寨首各自从寨中骑木马相向而行,两人交会处即为两寨土地分界线,挖土立石,以此划界。当然,骑木马技术娴熟者和健步如飞者多占优势,但当地人凡事都喜欢比个输赢。

“动土”,是一件神圣、庄严的事。古人有言:“百谷草木丽乎土”。土重即地重,地重实为地气之兴。《礼记·月令》云:“孟春之月,天气下降,地气上腾,天地和同,草木萌动”。农耕中国的历代先民们对土地都有着深厚的感情,既然“动土划界”了,即便“输少赢多”,也得心悦诚服。然而,两地竞争省会,并未涉及划界问题,不能直接照搬“骑木马划界”,只有在“土”字上做文章。

此可谓“唯有土,可服人心”。

于是,幕僚们创造性地提出了“秤土定省会”,把输赢的砝码交给脚下的土地,“以土服人”。

布政使大人当即表示首肯。众人连忙附和“此法甚好!此法甚好!”于是,贵阳和安顺两地主官各自连夜回到自己任所,沐浴焚香之后,取来一罐土,用红布包好带到布政司衙门。布政使大人净手后,当着两地绅耆的面,解开红布,取土称重。结果,取自贵阳之土略重于取自安顺之土。于是,布政使大人当众宣布贵阳获胜,取贵阳为省会,并宣读朝廷诏令。

两地官员绅耆,赢者欢愉,输者服气。从此,贵阳被历代官方确定为贵州行省治所,一直未曾变动。

当然,官方文献中、正史中不可能记载这段奇谈。然而,“秤土定省会”之说,却在黔中民间广为流传开来。

历史上建省,又或定省会,都是一件严肃的大事。这段“秤土定省会”之说,只是民间层面的传说。即便地方志有所引,亦不过是作为趣谈而入志。

准确说,这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谈,又或是坊间的一段“野史”而已。

今天的贵阳,居黔,则“一省之重”;居西南,则“四方所重”;居全国,则“赛江南”,似乎都印证了历史上的“贵阳土重”和“以土服人”之说。

据《贵阳文史》

(作者:姜秀波)